

殷海光文集

修订本

一卷

政治与宽容

张斌峰 何卓恩 编

Yin Hai Guang Wen Ji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殷海光文集

修订本

一卷

政治与宽容

张斌峰 何卓恩 编

Yin Hai Guang Wen Ji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海光文集(修订本)/张斌峰,何卓恩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216 - 03158 - 5

- I. 殷…
II. ①张…②何…
III. ①殷海光—文集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5708 号

殷海光文集(修订本)

张斌峰 何卓恩 编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00 毫米 1/16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85.25

字数:1 658 千字

插页:12

版次:2009 年 4 月第 2 版

印次:2009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 121 - 5 500

定价:180.00 元(共四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3158 - 5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重编说明

一、关于殷海光著作的文献价值

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继而生,既彼此对峙,又相互涵蕴,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思想世界。此一情境,在中国社会亦有体现,且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和特有的演变轨迹。

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价值的一种意识形态,但其具体内涵却十分错综复杂。大致说来,民族主义包含三大要素:对民族的爱(体现为民族凝聚力)、对民族强大的追求(体现为民族竞争力)、对民族共同生活合理秩序的向往(体现为合正义性)。民族主义贯穿始终的核心是主权观念,尤其主权的独立和自主行使。中国传统社会在儒家修齐治平的德治理想主导下,世界观为“天下主义”的,主权观念付之阙如,当然说不上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西方传统社会也没有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随着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出现,民族观念才得以形成,民族主义才相继出现。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将这些民族主义思想,引进到中国,用以挽救灾难深重的祖国。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直接以“民族”作为真实生命体,并在民族的观念下处理个人权利、阶级利益、地方利益等各种社会利益,主张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了民族和国家应该牺牲个人、阶级和地方利益。民族主义认为,个人生存形态表面上最真实,实际上却是最脆弱的。个人生活的追求,只有建基于以血缘、文化和共同政治生活为根柢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个人是“小我”,民族是“大我”,个体小我必须以民族大我为目的。所以,民族主义蕴涵着两种可能的趋势:积极方面对外争取独立和强大的趋势;消极方面对内漠视个人权利和尊严的趋势。

在近代中国,出现过多种标榜民族主义的政治势力,有的比较开明健康,有的比较集权保守。曾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国民党,就是比较右翼的民族主义集团之一,它的英文名称就是“中国民族主义党”(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矫正民族主义右翼倾向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系“个人自由主义”的约称,它以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为中心价值。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避世主义、放任主义有很大不同,它警惕国家和以国家名义所发生之权力对个人利益和尊严的侵害,却并不排斥国家生活及国家组织。自由主义是要在一个开放透明、权力有

限的法治政府下,维护个人追求自身幸福的自由。

自由主义以自然人性论为逻辑起点,主张生命是个人的,生命的目标是幸福,个人幸福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认为个人为社会的目的,社会为个人而存在,社会共同体是个人目标实现的工具,所以社会应该让个人有充分的选择理想、实现理想的自由。自由主义坚持,个人幸福的实现主要靠自己努力。任何领袖都是凡人,他可以有较高的品德,却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公心,其较高的品德在更大的诱惑下容易失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他可以有较高的智慧,却不可能完全掌握真理,“理未易明,事未易察”,没有人不犯错误,任何人的任何意见,都只能是待证的假设,不可以强迫他人接受,应该容许各种反对意见的存在,来检视和揭露权威意见的错漏。所以,公共权力尽管是必要的,却不能不加以严格限制、严密防范——用权力制约权力,用舆论制约权力,用选票制约权力。

自由主义力图以人性层面的普世平等和法律层面的公民平等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宪政秩序,来匡正右翼民族主义对国内政治生活正义性的忽略。西方如此,中国亦然。20世纪中国,服膺自由主义理想的主要代表者是新型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着深厚西学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

自由主义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它肯定了个人权利的普遍性,却忽略了个人能力的差异性。由于自由经济秩序势必发生“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社会成员的阶级分化、两极对立就越来越严重。弱势的劳动阶级日益贫困化,最终也会伤及资产者阶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发生危机。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主义应运而生。

与民族主义着眼于国家、自由主义着眼于个人不同,社会主义着眼于阶级。社会主义要求取消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私有制,并经由国家计划来实现社会共同生产和生活,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平等、幸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在西方产生的情况。社会主义在中国成为强劲思潮,倒不是由于自由经济秩序的建立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而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压力。中国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匡正民族主义的右翼倾向来激发健康的、理性的、开明的民族主义,以“国家上轨道”促“民族得振兴”;但是他们采取的往往是“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想启蒙方式,在列强加紧入侵的形势下,这种方式显然缓不济急。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就在于强力动员下层民众“反帝、反封”,重建国家。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派别众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路线最适合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具体国情。

大体来说,以国民党、自由派、共产党为代表的三大思潮,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思想世界,是在同一时空内鼎足而立、合纵连横,多数时候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民主派”)与自由派(“不革命的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以对抗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和官僚资本主义;20世纪后半期三大思潮的代表者并无变化,但表达和作用的时空环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路线主导大陆,国民党的右翼民族主义路

线主导台湾,自由派学人和中间党派的自由主义观念,在大陆通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基本被改造,在台湾也只是在夹缝里求生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后台湾的自由主义,虽然力量弱小,却在中国共产党无法实际发生制衡的情势下,单独承担起了对国民党及其右翼民族主义的制衡作用,发挥了社会批判的功能。殷海光便是此时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1949年跟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一批知识分子中,殷海光有其特别的代表性。海外学者、台港学者、大陆学者相继提出不少说法。归结起来,殷海光这个人物,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文化含义:首先他是一个思想家;其次,他是战后台湾地区的一个著名政论家和批评家;再次,他是20世纪中国社会演变的亲历者和观察者;最后作为自由主义思想人物,他代表了世界性自由主义思潮在东方的一种特殊发展历程。正是基于这样一些代表性,殷海光著作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

1. 殷海光著作是研究殷海光思想的基本史料。

殷海光研究在台港和海外华人学界,很早已有所开展,殷海光生前,已经有许倬云、金耀基、徐复观等人从学术角度涉足其思想的了解和批评。殷海光去世后,尽管相当时间处于所谓戒严时期,民间人士仍然定期开展追思活动,林毓生、张灏、罗业宏、黄展骥、陈鼓应等学者对殷海光的人格精神和思想建构进行了认真探讨,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思想解禁,殷海光研究更具规模,且日益成为高等学校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热门选题。2003年我到台湾访问,收集到的成品论文即有:《传统的断裂与延续:以徐复观与殷海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辨证为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1992)、《殷海光自由思想研究》(政治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96)、《救亡与启蒙的困境——殷海光思想转变之研究》(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1997)、《自由主义与当代新儒家的政治论述之比较:以殷海光、张佛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的论述为核心》(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1)等。其他研究成果方面,台湾“中央研究院”张忠栋教授出版了《胡适·雷震·殷海光》,香港也有学者出版有关殷海光的研究专著。这些著作都是以充分占有殷海光文献资料为前提的。台港和海外人士除了取得原始资料本身比较便利外,还有经整理的比较系统的文献资料。例如林正弘主编的18卷本《殷海光全集》于1990年出版,就较大地促进了殷海光研究的开展。研究殷海光当然需要广泛挖掘各种直接间接的史料,包括档案、报刊、公私信函、当事人访谈、史迹考察等等,但殷海光本人留下的著作,仍然是最基本的史料。

2. 殷海光著作可视为观察战后台湾社会真相并进而深入了解当前台湾政局变化的钥匙。

1990年代以后,尤其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后,台湾政象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以。一个跟国民党渊源并不深厚的李登辉,何以能够在蒋经国之后坐上国民党主席和台湾领导人宝座?一个身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何以一上台就向“台独”

方向演变？并在他任期届满时，竟然为反对党助选？何以国民党和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政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后一败再败？何以在众多“大老”一边倒地齐声支持王金平的形势下，以改革国民党相号召的马英九能够大比分赢得国民党主席普选的胜利，并最终赢得2008年“大选”，实现了台湾地区的第二次政党轮替？这一个个难解的谜摆在我们面前。当前大陆学界已经开始重视台湾研究，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数十个正式的台湾研究机构，北京、厦门、南京等地还有专门研究台湾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这些研究机构都在试图解开这些谜团。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着眼于当前时政观察者较多，而着眼于历史根源探讨的比较少。其实，台湾政局奇异变化，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本”“源”往往需要在过往历史中寻找。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殷海光著作在内的历史文献，可以为我们厘清真相提供不少重要线索。

3. 殷海光著作也可看作纵深分析20世纪中国社会演变的史料之一。

中英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运动的主题开始发生变化，由解决王朝危机为主转变为解决民族危机为主。经历洋务自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社会演变的节奏日益加快。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揭开了全国各阶层民众参与救亡图存，尤其是政党主导、武装斗争的序幕。从此，南方政府与北方政府的斗争，共产党苏维埃与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国共合作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陕北与南京的最后决战，烽烟滚滚，一浪高过一浪。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新中国政权，国民党当局逃亡台湾。在大陆，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占上风，政治斗争并没有因为敌党的被逐而停止，而是发展成为连续不断的内斗，直至“文化大革命”。而在台湾，国民党思想则越来越右倾，越来越朝传统皇权政治回归，制造出层出不穷的压制事件。直到1980年代，两岸才痛定思痛，调整政策，分别走上通往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追溯20世纪中国社会演变的复杂历程，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很多习以为常的观念值得反思。殷海光正好出生在转折关键点的五四时期，成长在急剧社会变动的战争时期，成熟于两岸隔海冷战而均未走入现代化建设正轨的艰困时期，他的体验、观察，通过他既热情又冷峻的笔，无疑会留下不少鲜活的印记。

4. 殷海光著作亦为考察自由主义思潮东方演变命运的佐证。

自由主义是世界性近代思潮，但东方与西方发展有着很大不同。自由主义对西方社会而言，是内生的，自发的。东方社会却完全不一样，自由主义不是东方文明自身演进的结果，而是全球化推进的产物。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运动，自从新航路开辟就以血与火的惨烈形态展开，推展到东方，引起东方各古老民族普遍的民族危机，这些民族在抵抗运动中逐渐觉悟到需要借鉴西方列强的社会文明来自强保种，才将自由主义作为救亡良法之一，引进东方。日本，土耳其，中国皆然。但是，自由主义观念要在国民中被接受，在实践中被落实，需要与脚下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结合，需要与大众的现实欲求相呼应；而在东方，历史文化中既很难找到现成的与自由主义相接近的思想，大众现实需求也主要不在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的落实上（而是更急迫的民族生存

问题),这就给在东方倡导自由主义的人们留下了很大的困惑。殷海光作为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的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主义的困境中,奋斗、思考,并且不断地“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他的思考和反思,对于研究自由主义这个世界思潮在东方的演变,有观察价值。

由于两岸长期隔绝,中国大陆的殷海光研究开展较晚。1988年,为配合中国大陆的文化讨论,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三联书店出版的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也包含两篇论述殷海光的文章,此后殷海光才为大陆学人所知,殷海光研究才延伸到大陆。1995年,方克立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家评传》专设殷海光传,标志着殷海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地位在大陆得到正式承认。迄今为止,大陆学人研究殷海光其人及其思想的文字,总量上已经为数不少,包括不少专门著作,但是,这些作者取得资料的途径,仍然是要从台湾调集。这种途径,一方面相当曲折,另一方面亦非一般研究者所能及,很难适应当前方兴未艾的研究形势。据笔者所了解,近年在大陆高校硕士、博士研究生中,以探讨殷海光思想为学位论文题目者,覆盖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学科领域,同时社会各种专门研究机构中关注殷海光思想的学者也在增多。而目前大陆出版的殷海光文献资料,还相当有限,而且比较零散,在不能直接从台湾搜集资料的情况下,显然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资料需要。

湖北人民出版社组织选编《殷海光文集》的目的,除了表现“港台和海外鄂籍学人”的学术贡献外,主要就是为了给研究殷海光思想的学者、研究1949年后台湾地方政治和社会思想文化史的学者、研究20世纪中国史的学者乃至研究世界自由民主思潮史的学者,提供一种比较有分量的文献资料。

二、关于《殷海光文集》修订版的选编思路

《殷海光文集》初版面世七年来,被相关论著和论文广泛征引,说明编者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初步适应了研究者的急切需要。现在,随着国内学术的推进,对于资料完整性和系统性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湖北人民出版社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决定及时增订和重编《殷海光文集》。受湖北人民出版社和原编者张斌峰教授委托,我具体承担了这次改版的选编工作。

这次改版除了继续保留原版绝大多数文献之外,有如下一些变化:

1. 在指导思想上,更加明确地突出了史料功能。原版在取材和编选上,以强调思想内容为主,注重文化价值;新版则在继续注重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加重了学术意义的分量。这次改版特别强调了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2. 基于资料完整性的考虑,新版比原版无论在篇幅上,在取材范围上,还是原貌保持方面,都有较大突破或改进。文集篇幅从原来的115万字,增加到170余万字,增幅较大。增加的文字,包括原版中删节部分的复原,包括从台湾版《殷海光全集》中增选的重要文献,还包括不少《殷海光全集》出版后新发现的文献。当然,原版中少数篇目也有未收入新版的情况。选录的文献,在内容上尽量涵摄殷海光一生思想的各层面,包括时政论述、学理探索、学术方法、文化思考等,而且尽量兼顾到他一生各个时期的思想。

3. 基于资料系统性的考虑,在结构上,这次改版采取专题与时间顺序结合的方式编排。原版分“政论篇”、“哲学篇”、“文化篇”、“书信与随笔篇”四卷,各卷内部时间顺序未作为主要考虑因素。新版根据思想主题,共分为四卷:政治与宽容;知识分子的使命;正确思想的评准;思想探索的旅程。前三卷主要是成年时期思想的方方面面,且重点突出学术性较强的思想;最后一卷则兼顾到早期和晚期。需要说明的是,1960年代中期,殷海光受中西文化论战的刺激,著成的洋洋40余万字的《中国文化的展望》,考虑到继1988年第一个简体字版之后,近年大陆又陆续出版多个版本,为了避免重复,最终只好割爱未收进文集。

各卷具体选编思路是:

第一卷,政治与宽容。

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广泛参与的战争中惨败,被迫撤退到光复刚刚四年的台湾岛。殷海光从1947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主笔,完整地了解到国民党军事失败的过程,并通过到战场慰问,亲身感受到军事失败只是果,政治失败才是因。撤退到台湾后,殷海光以多年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一片苦心,大声疾呼国民党应该痛定思痛,认真反省,放弃专制独裁,改走自由、民主、平等的道路。本卷选录的《政治与宽容》、《主义并非国教》、《论国民党底改造运动》等文,都是他这方面用意的表现。殷海光认为国民党改革政治,必须充分联合和信任自由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的基本政治理念,是来自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所以殷海光在呼吁国民党切实彻底改造的同时,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脉络和基本信条也进行了梳理。本卷收录的《争思想自由的历史巨流》、《自由主义的蕴涵》、《言论自由的认识及其基本条件》可谓其中有代表性者。

在大败之初,改造国民党和改革政治,实际上是国民党内的共同看法,但党人对于改造和改革的方向却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开明人士主张走自由民主之路,当权者却主张权力集中的政治和组织路线,意见始终不能统一。由于当时国民党限于空前的孤立,对外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恢复援助,对内需要团结自由知识分子加强其

统治的“合法性”，当权者并未强力压制开明人士言论，一意孤行自己的路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于自身战略需要恢复对国民党的全面援助，国民党当权派感到安全有了保障，已经无须再对开明派和自由知识分子采取怀柔政策，7月断然推行集权路线的改造方案。1952年10月，“国民党改造”完成，国民党和整个台湾社会从此落入蒋氏父子直接操控之下。对此，国民党开明派和自由知识分子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他们以胡适为旗号，以“五四精神”为指针，以《自由中国》半月刊为舞台，向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挑战。正是在这一时期，《自由中国》主笔殷海光逐渐成为反极权的思想斗士（殷氏1949年8月离开国民党党报）。本卷选收的《治乱的关键》、《这是国民党反省的时候》、《教育部长张其昀的民主观：君主的民主》、《再论君主的民主》、《反攻大陆问题》、《我们的教育》、《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请勿滥用“学术研究”之名》、《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为教师争人格》、《你要不要做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我们要有说真话的自由》、《大江东流挡不住！》等文，篇篇都是刺向独裁当局的利剑。在反对国民党极权统治过程中，殷海光也继续思考自由民主的真谛，思考自由知识分子努力应取的方向。《民主底试金石》、《自由的真义》、《个人为国家之本》、《自由之再划分》、《是什么，就说什么》、《创设讲理俱乐部》、《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我对于在野党的基本建议》等反映了这方面的见解。

《自由中国》半月刊与当局抗衡，一再引起停刊危机，1960年9月，终于因为雷震筹组反对党遭罗织入狱而停刊。殷海光不仅失去了思想作战的舞台，而且遭受接连不断的政治迫害，1969年，殷海光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在生命的晚年，殷海光思想努力的重点慢慢转到思考自由主义的思想机理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来。政治言论越来越注重理性的探讨，代表性的作品有《自由的伦理基础》、《我同罗素的讨论》、《权威与权力》等，临去世前他用英语撰写了长篇论文《剖析国民党》，对国民党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刻画。这几篇文章也收入了本卷。

第二卷，知识分子的使命。

殷海光在台湾的论政，完全是以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打断了中国传统士人内圣外王的体制性连接，读书人随之向现代职业知识分子转变；但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因为体制性连接的打断而断裂，因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表现出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游走的特性。殷海光不仅自身保持着传统士人治国平天下的热忱，而且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充满期待。

殷海光对知识分子挽救“国运”的期待，在撤退台湾之前就已经有了清楚的表达。1948年，国共决战形势逆转，发动“戡乱”战争的国民党政府军日益陷于被动，国民党政府日益孤立。其时还是《中央日报》主笔的殷海光，把“救国”的眼光投向国共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本卷选收了《五四与今日》、《论胡适南来》、《书生之用》等文章来表现这种心迹。而本卷收录的《五四运动三十年》、《给青年以新教育》等文，则是退到台

湾初期殷海光向国民党当局要求接受自由知识分子政治理念的声音；《忆金岳霖先生》、《我忆孟真先生》、《我所认识之“真正的自由人”》、《自由人的反省与再建》等文表达的是对自由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和批判视野的渴望；《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重整五四精神》、《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展开启蒙运动》、《胡适与国运》、《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取向》、《“五四”是我们的灯塔！》等表达的是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对梅部长的低调希望》、《〈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等文则显示了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

本卷选录的文献中，还有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内涵十分丰富。从提振知识分子精神的角度观察，这些书信尤其能够呈现殷海光本人作为特立独行的一位知识分子顽强奋斗所付出的代价，以及面对各种遭遇时的真切感受，读来催人泪下。

第三卷，正确思想的评准。

殷海光不仅认为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负有特殊责任，同时也认为正确的思想方法异常重要。本卷收录的文献，主要就是殷海光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

这些论述可以按照不同层次归入四类：

第一类为对西方科学方法的介引，如《逻辑经验论导释》、《运作论》、《因果底解析》、《罗素底后设科学及其影响》、《科学及其基本》、《科学与唯物论》、《论科学的说明》、《逻辑经验论底再认识》、《语言世界和经验世界》等。

第二类为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如《怎样研究哲学？》、《经验科学整合底基础》、《政治科学底指归》、《怎样研究民族主义？》、《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后设历史学试论》、《试论信仰的科学》、《论科际整合》等。

第三类为如何用科学方法认识 and 对待现实问题，如《张其昀部长的原子迷》、《怎样判别是非》、《从有颜色的思想到无颜色的思想》、《正确思想的评准》等。

第四类为对科学与民主关系的说明，如《论科学与民主》、《成见与进步》、《论认知的独立》、《宗教与独断》等。

第四卷，思想探索的旅程。

前三卷着力展示殷海光比较突出的思想层面，所以结构上采取断面处理方式；本卷的用意则在于动态呈现殷海光一生思想的演变过程，为此，略分五个阶段来选录文献：

第一阶段反映殷海光从一个爱读书爱辩论的高中生到一个盲从的“三民主义者”再到自觉放弃三民主义的心路历程，主要收录有《意志自由底检讨》、《〈逻辑基本〉译者引语》、《中国现代政治思潮》、《赶快收拾人心》、《革新问题》、《传统底价值》、《论科学的态度》等文。

第二阶段反映殷海光在放弃三民主义之际，如何从借鉴他山之石来再造自己的思想基础。主要收录有殷海光评介和译述的《罗素论权威与个体》、《文明是怎样创造的？》、《科学与社会》、《罗素论权力》、《自然思想与人文思想》及《到奴役之路》译序等

文,这些外来思想资源的阅读和介引是殷海光走向自由主义的重要学理准备,从中可以看出前三卷思想来源的蛛丝马迹。殷海光晚年思想反省过程中也曾出现新一轮的外来思想介引,这里将《海耶克论自由的创造力——从“无知论”出发》也一并收入。实际上殷海光的外来思想介引,既有准确了解的部分,亦有误读的部分。

第三阶段反映殷海光作为西化论自由主义者的情感困惑。主要收录他到美国访问期间所作的游记《西行漫记》和《旅人随记》,这些文字表达了殷海光对于西方思想理智上欢迎的同时,对于西方机械文明在情感上的厌恶和抵触。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知识分子的困惑,即使主张西化者也不例外。

第四阶段,殷海光失去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论述舞台之后,屡遭迫害和横逆,为了生活曾一度卖文争取些许稿费。这些挣稿费的文字,主要的言论对象是当时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的台湾,大陆报刊完全被禁绝,殷海光仅仅凭藉港台报刊的零星报道,便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评论,不能不使人感佩殷海光敏锐的洞察力。为反映这种思想锐力,收录的文章有《这样的红卫兵》、《红卫兵是义和团吗?》、《文化的自杀》、《向坟墓进军》等。

第五阶段反映殷海光晚年对自己《自由中国》时期的思想缺失,尤其对当时激烈反传统的文化观,所进行的冷静反省和超越。收录的文献有《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基石》、《现代中国新传统主义研究纲要》、《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评韦政通的两本书》、《五四的再认识》、《五四的隐没与再现: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而作》、《最后的话语》等,其中有的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反省人生,克服了既往片面的科学主义人生观;有的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反省文化,克服了既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执的排斥。《最后的话语》中,殷海光明确地提出了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如何结合的问题,这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最痛切的检讨。

以上四卷,每卷基本依文献生成的时间为序。文献生成的时间,一般指发表时间;但如果写作与发表间隔较长,则以写作时间为准。对于部分连载作品,为便于阅读,采取集中编排,次序以首期发表为准。在文集的最后,为了读者研究的方便,提供了一份相对比较全面的《殷海光著作年表》。应该说明的是,殷海光一生的文字撰述,根据他本人的说法,应有800万字之巨,但由于种种原因,今人能够具体了解的(经过两岸和香港学者的发掘),大概不及三分之二,其他文字尚有待学者继续发掘。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殷海光一生中最大规模的完整专著《中国文化的展望》,虽然我们在选编中不得不忍痛割爱,却有必要郑重推荐给读者通过其他版本阅读。这部作品共包括十五章,以一个“准系统的模态”展开:

“所设”部分:首先提出中国文化问题何以出现【第一章】;接着讨论文化的概念【第二章】和文化运动的一般机理【第三章】。

问题部分: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第四章】及其近代调适失败【第五章】的

历史分析,揭示出近百年来的社会文化重要问题之所在。

意见部分:论述中国今后所可能和必须努力的道路及方向。包括一个总说【第六章】,一组驳论和一组立论,总体上运用逻辑的分析方式,既批评了守旧派【第七章】,又批评了极端反传统和笼统西化派【第八、九章】,以及折衷派【第十章】的主要错误观点,在此基础上对于全面现代化——现代化的含义及科技现代化【第十一章】,政治现代化【第十二、十三章】,道德精神现代化【第十四章】进行了具体阐述。

结论部分:论著将革新中国文化的希望寄托到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第十五章】。

该著作 1960 年代中期在台湾一出版,即引起广泛社会反响,并遭当局查禁。台湾解严后,该著被多家出版社再版,深得读者欢迎。

三、关于殷海光的主要思想观点与殷海光文献的阅读问题

殷海光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一段带有人生总结性质的话:“在一方面,我向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的奋战;在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而且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海光文选自叙》,见第二卷)这一段夫子自道,可谓最简洁地勾勒了殷海光一生,尤其其成年时期的大致思想轮廓。殷海光的思想,扼要来说,包括以下基本观点:

1. “革命”之后需要再启蒙。

殷海光曾供职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对于思想的功能一直很注重。他的思想从国民党意识形态叛逆出来之后,他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教人都会思想,能知道如何辨别是非,逼近真理;如何坚定地走现代文明的道路。他有很强的信心和信念,要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当然指的是国民党所标榜的“革命”)浪潮之后,再来一次“五四”式的启蒙运动。他曾多次自称“五四的儿子”、“五四后期人物”,就是以跟着“五四”启蒙运动脚步前进自命。他认为“五四”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在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之后,中国社会所需要进行的急切工作,就是要继续“五四”人物未竟的事业,使“民主”、“科学”深入人心,并重建新的社会道德。

殷海光以“五四”为启蒙旗帜,并不是笼统地肯定“五四”时期的每一种思想,他将“五四”的含义明确限定在“胡适思想”上。用“胡适思想”诠释“五四精神”,是他的思

想进入自由主义论域后的必然。他认为,“胡适思想”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核心,胡适思想之消长是中国国运起伏的寒暑表:“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正是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反之,中国底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锢蔽之时,也就是‘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左右两种势力一直与“胡适思想”过不去,原因不外左右两方面的思想在背后有基本的共同点——都是绝对主义的、权威主义的、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群体至上组织至上的、自我中心的;而“胡适思想”,因为是主渐进的、重具体的、反教条的、个人本位的、存疑的、重实证的、启蒙的,与它们格格不入。“必须‘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荡荡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底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发泄,就是历史的浪费”(《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见第二卷)。

殷海光认为五四运动是与“革命”话语相对待的一场兼摄“清除”(德文)和“光照”(法文)二义启蒙运动,着意清除“部族思想”,光照“科学与民主”,可是,这一工作远未完成。“中国的问题,既非靠复古神话所能解决,更非靠暴力与‘革命’这类方式所能解决:在一长远历程中,我们能够藉着启蒙运动为中国开启一条有希望的道路”(《展开启蒙运动》,见第二卷)。“革命”是社会病态发展的产品,是反科学反民主的,科学与民主是我们的灯塔(《“五四”是我们的灯塔!》,见第二卷)。殷海光凭藉《自由中国》,高扬五四旗帜,延续五四启蒙精神,最终成为那个时代台湾自由主义的思想领航人。

2. 自由、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正途”。

殷海光再启蒙的目标,在社会体制上,表现为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追求。他坚持认为,自由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正途”。

关于自由,历来有相当歧异的理解。殷海光说“讲自由,并不就是散漫、随便,和高兴怎样便怎样”,也不是“德式玄学家所说的抽象‘理念’或‘观念’”,更不是破产了的“那些言不由衷的政治口号”,“而是每个人所能实实证证地感受到的那些基本人权,例如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行动自由、住居自由、建构自由(freedom of institution)等等……这些种类的个人自由是不可渡让和剥夺的……与人底生命、名誉,与财产之不可渡让与剥夺正同”。由于自由价值的终极性,自由是目的,政治是手段,“政治是为了人生,人生不是为了政治”。现代政治追求合理性,合理的政治自然不能违背自由人权这个根本目标。现代政治固然是民族国家形态下的政治,但爱国并不构成贬损个人自由的理由。“有而且唯有在大多数人能够抬起头做人的国家,谈着重国家之事才不必出于勉强。如果一个国家到了一种地步,谈个人自由和着重国家已经不甚融洽,那么这个国家底健康一定发生问题了。健康发生问题的国家,便会衍出这些悲惨的结果:人民宁愿‘与尔偕亡’;或者,统治机构必须以各种手段打击个人自由,并且时常‘大力宣传’,要大家‘爱国’。一个国家到了需要把‘爱国’,‘爱国’挂在嘴边,那一定是人民大众底‘爱国’发生了问题。大家觉得‘国家’是一大负担,是一大恐怖,叫他

们怎样去‘爱’啊！”（《政治组织与个人自由》，未录入本集）

殷海光反对把国家看作一个抽象的整体（metaphysical entity）的“玄学国家观”，认同实证论的国家观，把国家看作一个实际的法治联合（legal association）。他说国家不是没有份子的“空类（null class）”，也不是只有一个份子的“独类（unique class）”，而是有份子的“每一类”。一个一个的个人即各别地为国家之不可消革的真实主体。国家于是成为个人之间多项交互关系的丛结，而所谓爱国，归根到底，无非“在一特有传习的界域以内，一个一个的个人爱他自己而且又彼此相爱”（同上）。这种爱国，也就是爱个人的自由。只有在以实证论国家观为基础的民主国家才有真正意义的爱国，在信奉玄学国家观的极权国家，“爱国”无异于听任驱策。在殷海光看来，“个人为国家的根本”（《个人为国家之本》，第一卷）。个人自由的价值不是什么“明天开奖”，更不是“牺牲这一代以为下一代”，而是对于一个一个的活人有帮助。个人自由是每一个常人的自然权利，这些基本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防线。“搞政治”者，应当“搞”“人的政治”，不把人变畜。独裁者总是编造各种谎言体系剥夺个人自由，独裁者为什么怕自由呢？原因是：有自由便无独裁（《独裁怕自由》，未录入本集）。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殷海光站在自由主义立场，高度关注台湾民主运动的开展。对于国民党当局的伪民主观，他进行了犀利的揭露和批驳。1956年，曾任国民党秘书长、改造委员会委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教育部门负责人的大人物张其昀，公开宣称“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谛”是“爱民”、“教民”、“养民”。殷海光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民主实在是一种荒谬的“君主的民主”，其中含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复古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国民经济主义，尤其是“牧民思想”，却丝毫找不到民主的痕迹。这种“君主的民主”，充其量不过是“慈惠的君主专制”，它与极权暴政只有咫尺之遥。他坚持认为“民主的真正核心是基本人权之肯定。凡避开基本人权而谈民主者，不是对民主感到不安，便是对民主没有诚意”（《教育部长张其昀的民主观》，第一卷）。殷海光指出国民党敌视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原因，是利害关系、尤其是权力欲作怪。基于权力欲，他们对讲民主自由深怀戒心；又慑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浪潮，对民主自由不便明言反对。结果陷入水土不服，冷热不调，行动上忽进忽退、忽倨忽恭、忽即忽离，言论上别别扭扭、阴阳怪气、前后矛盾、不知所云。殷海光断定敌视自由民主是“自毁长城”，只有顺乎民主潮流，才不会被历史淘汰。

殷海光晚年，进入比较沉静的理论思考时期，对于自由民主的确切内涵和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对于自由，他更强调其整全性；对于民主，他更强调其作为“最不坏制度”的功能优势；对于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他则看得比过去更复杂，更平实，也更准确。他说，民主政府本质上是个服务系统，镇制权的使用受到限制，百姓比较有地位，比较接近自由。而且，就历史的发展来说，民主政制和自由主义有着客观上的一致。但是，又与民主可以有自由主义以外的理论基础，它与自由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等同。通常把民主与极权对称，自由与专制对称，这是乱点鸳鸯谱，配错了对儿。民

主政制的反面是专制政治,自由主义的反面是极权主义。这也就是说,在专制政制之下一定没有民主政制,可是不一定没有自由主义;在极权主义之下一定没有自由主义,可是不一定没有民主政制。民主政制和自由主义的排列组合一共有四种可能——既民主又自由,有民主而少自由,无民主而有自由,既无民主又少自由。他认为这四种可能不仅是逻辑上的,也是事实上的,按他的意思,现代美国、雅各宾的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清王朝有效统治下的中国,分别可以作为这四种情况的例证。有鉴于民主与自由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尤其是民主并不必然带来自由的现实,殷海光不再无条件推崇民主,而把他的民主理想限定为“自由的民主制度”——既民主又自由。

3. “讲理”。

五四的另一个题目是“科学”。殷海光决心沿着五四的道路前进,当然也会提倡科学。跟五四人物一样,殷海光提倡“科学”,主要偏重的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他看来,这种意义上的科学,不仅有知识上求真理的功能,而且有着强大的社会功能——是实现自由民主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

在殷海光看来,科学作为一种态度,对学术研究而言,就是要守住科学的严谨性、客观性,“是什么就是什么”,否则,就是非科学的(如宗教、文学、艺术等)或反科学的(如迷信、玄学语言等);科学作为方法,则要求无论讨论自然,还是讨论哲学、历史、或政治科学,都要克服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朴学式的弊病”(病在琐碎)和“理学式的弊病”(病在空疏)。殷海光相当执著地追求以科学为基础,贯通人文领域,实现“科际整合”,总是希望将“人理学”建构得如同物理学那样严密、客观、有条理。

殷海光出于“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倡导科学,只是浅层的原因。深层的动机是与他的社会思想家角色相关联的。殷海光自承:“我二三十年来与其说是为科学方法而提倡科学方法,不如说是为反权威主义,反独断主义,反蒙昧主义(obscurantism),反许多形色的 ideologies(意理)而提倡科学方法。”(《致林毓生》,见第二卷)殷海光学术上追求的科际整合,自觉不自觉的用意,是要用现代分析哲学的武器,从事“思想清道夫”的工作,打破常常被用作极权统治基础的各种非理性“主义”的“虐政”。

殷海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由民主的目标而讲“科学”,他认为,近代以来民主所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非科学非理性的力量:来自左方的泛政治主义在社会基础上打击民主,来自右方的泛道德主义从伦理基础上轻忽民主。科学的态度是“印证的”、“怀疑的”、“累聚的”、“试行的”、“系统的”、“互为主观的”、“运作的”态度,也是“讲理”的态度,而不讲理,则没有自由民主可言。所以,他主张,在社会生活领域要有讲理的风气和环境。民主政治真要实行,必须讲理:愿意讲理并知道怎样讲理。讲理就是要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一切题材,包括伦范、道德和价值。“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养成讲理习惯的两条设准。

将科学的功能延伸到科学以外的人生、社会、历史领域,用科学解决人文的课题,尤其是自由民主的问题,这也是“五四”遗产的一部分。与“五四”前辈稍有不同的是,殷海光的“科学”主要来自罗素、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的知性传统影响。这一传统相对于“五四”时期所流行的杜威学说,显得更为激进。殷海光1951年开始系统征引这一学派的思想,对一切一元论、观念论、整全论,一切宏大叙事的“主义”和政治“哲学”,持激烈批评立场,宣判它们既不是分析命题,又不是经验命题,在认知上“毫无意义”。在他进入生命晚期之前,一直主张以经验与逻辑为唯一凭藉,进行“没有颜色的”思想。

4. “自由”、“民主”如何生根。

矢志于再启蒙的殷海光,在如何对待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上,也颇费心力。既然殷海光思想关注的中心在于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那么,中国固有文化问题便实际上是自由民主在中国的生根问题。

关于自由民主在中国如何生根,直到今天并没有很令人信服解决方案。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是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的障碍,要倡导“德先生”、“赛先生”,就必须“打倒孔家店”。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在一般人们的观念中,自由主义与反传统主义或全盘西化主义,几乎是同一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殷海光实际上也没有脱离这一走向。他公开说平生思想上最大的敌人就是道学,在任何场合之下,不辞与所有道学战。所谓“道学”,固然重点指国民党当局所宣讲的“四维八德”,也泛指一般的传统儒学,有时殷海光还用“玄学”、“历史主义”、“泛道德主义”等名词指称。

殷海光反道学,反传统,基本的理据有两点:一为认知性的,即中国传统缺乏清晰的思想系统和方法系统,不便于“讲理”。殷海光一直认为,要实现思想自由,首先必须能自由思想;而真正自由地思想,便不能不摒弃一切思想的桎梏,传统就是应该摒弃的桎梏之一。“我深恶历史主义,痛恨一些人夸张‘历史文化’”,“一想到东方人那种混沌头脑和语言,我立即怒火中烧”,因为这些“鬼话”都是“无意义的语言”(《致王道》,见第二卷),最容易引起“思想之走私”(《新实证论的基本概念》,未收入本集)。二为体制性的,即中国传统代表专制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帮凶,因为“依据向量分析(vector analysis),复古主义与现实权力二者的方向相同,互相导演,互为表里,彼此构煽”,这种专制文化与现时代自由民主的主潮背道而驰。比如说,中国的家长制的传统,就是极权统治建构最重要的心理原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就是新闻封锁、统制教育的理据;“天子”观念,发展所及就是“伟大领袖”、“民族超人”。事实上台湾的党化文化与旧有文化正是互为表里:“党化文化的根本想法,党化文化的基本模态,翻来覆去,不是天外飞来的东西,根本还是中国固有的。”

除了从自由民主方面立论,殷海光还从现代化的视野来说明传统主义的不可行。殷海光接引汤因比提出的“冲击—反应”文明发展模式论,说明一种弱势文明受到强